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

零对等 翻译探索

——兼谈应用翻译的理论指导

李江春 著

海南出版社

零对等翻译探索

——兼谈应用翻译的理论指导

李江春 著

本著作系作者主持的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2008 年度立项资助课题《商务英语教学与实践中的零对等翻译研究》(课题编号: XJK08BGD035)的研究成果。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零对等翻译探索 / 李江春著. —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9.8

ISBN 978 - 7 - 5443 - 3107 - 4

I. 零… II. 李… III. 商务—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0363 号

零对等翻译探索

李江春 著

责任编辑:古 华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地 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 编:570216

电 话:0898—66830929 (海口)

0731—84863905 (长沙)

网 址:<http://www.hncbs.cn>

印 刷:长沙科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5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43 - 3107 - 4

定 价:26.80元

|| 前 言 ||

“常常听到一种意见,说翻译是一门艺术,无所谓理论不理论,似乎它是超乎理论之上的。事实上,任何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在他的工作过程中都必然会遵循某种方针。原来没有什么理论认识的人,在实践中也会摸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他的理论。”笔者借助金隄《等效翻译探索》一书中的这段话作为拙著的开言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本书旨在阐述一种创新的翻译理论——“零对等”翻译理论,这是笔者在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与实践中所总结并验证行之有效的翻译理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和日益发展,我国的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向着现代化的商业大步迈进。商业的发展自然带来了日益频繁的商务活动。而在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并不断扩大同其他国家之间经济贸易往来的今天,中国的商务活动跨越了国界,成为国际商务活动的一部分。任何商务活动都要依托语言来进行,语言按使用方式可分为口语体和书面体。而本书主要是以书面体的商务英语为载体介绍“零对等”翻译理论。

商务英语翻译是目前国内许多高校英语专业或翻译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该课程一般开设一个学期,故本书对商务活动中涉及文本的翻译有选择性地介绍,具体包括商务信函、商业广告、产品说明书、商名或标牌、商务合同、国际商务信用证、公司备忘录、旅游宣传材料和经济类文本的英汉翻译中“零对等”翻译。

本书是笔者根据翻译教学经验、商务英语翻译研究经验、商务翻译调查经验,综合各高校所开设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设置情况以及笔者通过听取兄弟院校商务英语翻译课程内容等情况所著。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载体内容较全较新。所研究的内容几乎囊括高校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所涉及的全部内容,研究的载体即商务英语文本材料均选自高校现行翻译教材或取材于最新的商务翻译实践。

翻译理论具有独特的创新性。方梦之教授曾在2003年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侧记《我国的应用翻译:定位与学术研究》中指出,应“加强应用翻译的理论研究”(《中国翻译》2003.11第六期:48)并在文中提到她对“20世纪下半叶我国翻译研究的成果作过定量分析,发现我国的应用翻译研究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有起色,而基础相对薄弱:起步晚,讨论微观技巧多,选题重复,无系统理论,学术底气不足”。(《中国翻译》2003,11,第六期:47)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在应用翻译领域(商务英语属于应用英语)的研究仍旧不见有多大起色,仍然还是研究微观的多。本研究乃是笔者主持的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商务英语教学与实践中的零对等翻译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所提倡的“零对等”翻译理论有其独特的创新之处,将其应用于商务英语翻译研究,更具有无限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在此,笔者十分感谢课题主管部门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学术平台。

本书对“零对等”翻译的探讨与其他翻译理论一样,重在描写,取材于“一万”,希望“万中有一”,希望本书所著对我国的翻译理论体系构建能有点滴贡献。但本书并不是完全关于理论的书,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小作。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要感谢海南出版社给予的大力支持,还要感谢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主任刘岗教授的热心指导和积极鼓励。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系教授、湖南知名专家廖瑛老师对本研究给予了细致而全面的专业指导,课题组各位参与人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英语或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翻译专业学生、广大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的高校教师、从事商务翻译实务的工作人员和翻译爱好者等使用。由于时间仓促,笔者水平有限,加上商务英语翻译等应用翻译领域的知识无时无刻不在更新之中,译海浩淼如烟,难免挂一漏万,存在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江春

2009年初夏·长沙

目 录

上篇 翻译理论

第一章	概论	(1)
第二章	国外代表性翻译理论略论	(5)
第三章	国内代表性翻译理论略论	(13)
第四章	中西翻译理论研究方向略论	(22)
第五章	“零对等”翻译理论的提出	(28)

中篇 商务英语教学与实践中的零对等翻译

第六章 商务英语语言与文体	(33)
第一节 再谈商务英语语言与文体特色	(33)
第二节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在商务英语中的应用	(40)
第三节 国际商务活动中的女性客体语	(45)
第七章 商务英语教学与应用	(50)
第一节 商务英语教学方法多元论	(50)
第二节 翻译与专业英语教学	(57)
第三节 商务英语选词技巧与国际商务谈判	(62)
第八章 标牌的零对等翻译	(70)
第一节 标牌翻译的影响因素	(70)
第二节 标牌的零对等翻译	(77)

2 零对等翻译探索

第九章 常用词的零对等翻译	(81)
第一节 惯用语的翻译	(81)
第二节 易混词的翻译	(87)
第三节 隐喻词的翻译	(91)
第十章 句子的零对等翻译	(97)
第一节 模糊语的翻译	(97)
第二节 合同中长句的翻译	(101)
第十一章 商务语篇的零对等翻译	(114)
第十二章 广告的零对等翻译	(119)
第一节 广告的零对等翻译——之一	(119)
第二节 广告的零对等翻译——之二	(126)
第十三章 “接受者”信息与商务翻译中的零对等	(134)

下篇 翻译人才培养

第十四章 培养的基础——翻译能力的构成及发展层次剖析	(140)
第十五章 应用英语翻译人才培养途径	(149)
附录	(155)
参考文献	(196)

· 上篇 翻译理论 ·

第一章 概 论

毫无疑问,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得到普遍认可,但是我们在网上查询时,比如查询“翻译”的“中图分类号”时,“翻译”并不是一个独立学科,像语言学、社会学等等,而是依然隶属于“语言学”,本书并不是着意为争取翻译学“独立”而著,因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已有诸多大家之诸多大作都是为此而作,如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2005年更新为《新编当代翻译理论》)、谭载喜的《翻译学》等。本书旨在根据近年来大学者、翻译研究家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一番思考。这个思考也应了方梦之教授在2003年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侧记中提出的要求(见前所述)。另外,笔者以“应用翻译”和“理论指导”同时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查询(2003—2009)科研成果,发现所有的记录如下:①从功能理论视角谈应用翻译(论文),刘美华,《上海翻译》,2009年第1期;②试从功能翻译理论浅析应用翻译(论文),杜欣欣,《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③从建构主义观点谈商务英语翻译教学(论文),陈炼,《黑龙江教育》,2006年第6期;④应用翻译呼唤理论指导(论文),杜克难,《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3期;⑤功能派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论文),《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1期;⑥动态对等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国际商务合同翻译(论文),尹帅,《现代企业教育》,2009年第6期;⑦从功能加忠诚翻译理论看商务翻译(论文),金敏娜,《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⑧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商务合同翻译(论文),杨芳,《中国科技翻译》,2005年第1期。从以上资料可知至今为止尚未有创新的应用翻译指导性理论的文章或著作,虽然也有像贾文波著的《应用翻译理论与实践》(2004年5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之类的书,但细看其中也并未有专门独到地提出自己所创新的翻译理论,因此,根据笔者多年来的应用翻译教学经验、科研体会,特提出“零对等”翻译理论,以期能指导应用翻译教学与实践。

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历史悠久,且在指导我国翻译专业发展中功不可没,但无可争议它也有多方面的历史局限性。我国翻译理论大家刘宓庆指出我国传统译论局限性如下:

第一,传统译论的范畴研究十分薄弱,因而使翻译理论探讨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千余年中甚少开拓。究其根由,受封闭性观念影响很深。翻译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如果不突破封闭性观念局限,学科的发展研究势必深受束缚。因此,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必须将翻译学视为一门开放性、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力求在这个新观念指导下,构筑翻译学的科学构架。

第二,传统翻译基本理论命题非常有限,对策性很弱。古典译论家中不乏精言宏论,但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是受历史局限的影响,特别是受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要建立和发展翻译学,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现代翻译基本理论的研究,努力推出中国自己的基本理论模式,作为现代翻译学学科构架的主轴或基础。

第三,传统译论的方法论必须革新。传统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有以下薄弱点:首先,古典和近代译论家通常局限于传统文艺评论特别是传统文艺美学的方法论影响,注重宏观描述,强调主体的迁移性“了悟”或“悟性”过程;而在微观剖析上对客体(译作及翻译过程)缺乏科学的、系统的形式论证方法。由于缺乏科学的形

式论证,因此,译论界常常限于诠释学争论(interpretative disagreement)中,致使理论缺乏应有的实践意义。当然我们不能抹杀学术上争鸣的积极作用,但论争的目的应该是一种对策探讨,应该落脚在开拓上。

本书是立意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开拓的一个尝试。笔者力图继承古典和近代译论的历史功绩,摆脱其局限性,结合自身的应用英语翻译教学与实践,创新地提出“零对等”翻译理论,以期能指导应用翻译,包括英译汉和汉译英。毫无疑问,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我们既要做到无愧于前人,又要做到有益于来者。笔者在多年的思度和研究中深感力不从心,唯有励精图治,在自勉和前辈学者及授业师长的鞭策下奋力以求。笔者的基本信念是:中国有源远流长的翻译实践史,卓见纷纭的翻译理论史;在历史上以及近代、当代有无愧于哲人及大师称号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植根于世所罕见的丰厚的中华文化特别是文学、美学、文论的土壤之中的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之芽,一定会成长为一颗挺拔苍翠的大树,自立于世界现代翻译理论之林。

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到实践中去。任何理论都有它的作用或职能。根据刘宓庆的观点,翻译理论的职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认知职能(cognitive function),也就是翻译理论的启蒙作用

翻译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有其本身的艺术规律和科学规律。翻译理论是对这些规律的深入、系统的探讨,其目的在使翻译只能“神而明之”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可知的(knowable)客体、可掌握的(workable)规范和条理化的(methodic)体系。翻译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的既是一种对翻译的客观规律性的宏观描写,又是对这些规律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机制的深层分析。通过翻译理论的揭示,可以使我們认识到翻译作为语际转换过程的实质,翻译的各项基本规范以及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在转换中的行为模式。

二、执行职能 (performing function), 也就是翻译的能动性和实践性

翻译理论应能指导我们认识翻译艺术和翻译科学的规律,而翻译者,凭借翻译理论的科学论证及方法论的引导,在实践中应能有选择地“实施”翻译理论所提供的“参照性指令”。由于参照指令都具有选择性、多样性,因此翻译者在面对某一课题或难点时,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对策手段,这样就使翻译过程具有很大的变通性。显然,具备翻译理论所赋予的这种能动性与不具备这种能动性,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它使翻译技能从自在行为上升为自为行为,使翻译实践成为高层次的语际交流,而不再是匠人式的技艺。

三、校正职能 (revising function), 也就是翻译理论的规范性、指导性

由于翻译理论具有执行(实施)职能,因此它具有指导性,而其指导性又源于其相对的规范性。翻译理论为我们提供种种经过语言科学、符号学或美学原理所论证的选择性参照指令,使我们在语际转换中有可供参照的实施手段;同时也就使我们更能辨明正误,校正偏差。翻译理论的指导性集中表现为它具有提供对策(strategy)的功能。这是因为双语对比研究是翻译理论的基石之一,而对比研究的基本目的就是为语际交流提供对策。翻译理论的对策性既体现了其实施职能,又体现了其校正职能。

四、提升职能 (enhancing function), 也就是翻译理论对实践经验的加工、提炼作用

大家知道经验是“很灵”的,但不是百试不爽的;经验是丰富多彩的,但它可能是芜杂、粗糙的;经验是实用的,但它可能是止于表面的;最后,经验是十分可贵的,但它绝不是一劳永逸的。正是由于经验具有上述种种特点,才需要理论对它进行加工、提炼,就是我们常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使经验得

到质的提升。这就叫经验的深化、条理化、系统化和相对规范化。理论正是使翻译从“经验”提升到“经验科学”的关键。

“零对等”翻译理论当然也不例外,希望愿意借鉴此理论的“敢于吃螃蟹”的“勇者”能得到多方面的触通。

第二章 国外代表性翻译理论略论

一、二分法

自从公元前一世纪西赛罗提出“二分法”(即 the dichotomy of word and sense)以来,众多的西方翻译理论家以此为焦点争论了两千余年。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翻译《圣经》的德国翻译家马丁路德,他提倡翻译后的语言应该通俗易懂、妇孺皆知,他遵循的主要是“sense for sense”的原则,而不是“word for word”,即采用“意译”不是“直译”。1902年,意大利的克拉奇说,“终极翻译是不可能的事”,也就是说,无论你以什么翻译理论或原则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译品总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他的观点为大家所认可,不过译事仍然不间断地进行,而且多数译品皆是成功的,那么有人认为错的只是理论本身,因为它是片面的、绝对的,再者翻译的源语材料本身也有障碍。至于别的《圣经》翻译者大举推崇“直译”,且可“对等”,是因为《圣经》及一些古典作品的翻译仅是特殊案例,而不可将其作为建立一个普遍翻译理论的基础。

二、三分法

十七世纪德莱顿提出了“三分法”即直译(metaphrase)、仿作(imitation)和介乎其间的意译(paraphrase)。其中直译也叫逐字对译,这是他最反对的,并将其比喻为“带着镣铐在绳子上跳舞”。德莱顿本人译得最多的是诗歌,他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出的“三分法”实际上只适应于诗译。关于如何译好一个作品,德莱顿

还进一步指出译者应对原作有透彻的理解、对源语与译语应运用自如、不能逐字对译、必须使用地道的语言、必须追求一种流畅、优雅、不矫饰、不做作的平实的文风。

1790年,泰特勒也曾提出要译好一篇文章必须作到如下三点:译作需表现原作完整的意思;译作行文的风格应与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当拥有原作通顺的风格。

由此可见无论是德莱顿还是泰特勒,他们通过对翻译过来的经典作品的研究以及作者自身的翻译实践得出的结论的共通之处是“对等”。不过,大多数翻译理论家如 Mary Snell-Hornby 等都认为“完全对等”是难以达到的幻觉。

三、对等理论的建立与发展

正值此时,英语研究界也开始建立翻译的语言学途径。以美国 Eugene A. Nida 为代表的“对等理论”建立在功能转换生成语法基础上;以英国 J. C. Catford 为代表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韩礼德的系统语法概念上。

Wilss 认为,直译与意译之争或以源语为中心还是以译语为中心的争论毫无价值,语际之间的中心物(想象出来的)成为翻译理论参照物的中心点时,翻译的轮廓才开始出现。1965年 Catford 指出,翻译就是源文本通过对等物表达成译本,即寻找与源语言最切合的自然的对等。十年后,德国的翻译理论家指出:从意义来说我们仅把翻译看作满足规范要求的对等物,在我们看来一个词的真正意义应当满足规范对等物的具体要求。上述三个理论虽然相差 14 年,但定义里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讨论早期,对于什么是对等有不同意见,不管是词还是句子,后来出现了“翻译单位”这个概念,通常被理解为词与句子间的衔接片断,因此,此时出现了基于全文本的“对等”概念,对等不仅是建立在整体原作文本与译本之间,同时也是建立在翻译单位之间。

70年代早期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翻译理论把文本看做是单位之间的线性序列,而翻译就是一个替代的转码或取代,即甲语言中的要素甲、乙、丙,被乙语言中的要素 A、B、C 所取代。它所要求的是,确定翻译单位,从各种不同的对等中选择“最佳对等”。这种争论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建立在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上:它预设了一个平行对称。这种想法的错误就在于“equivalence”本身。

历史发展的轨迹与区域不一样,使得两种语言间有根本差异。在过去 150 年里,“equivalence”曾不断用于科技翻译中,在数学、形式逻辑中表示绝对对称平等的关系,故有可逆性,而在英语通用词汇里,equivalence 只是一句空话。《牛津字典》里 1460 年才收入“equivalent”这个词,而“equivalence”这个词直到 1541 年才收入。也就是说,equivalent/equivalence 既可用作精确界定了的科学术语,同时亦可作用词义上比较空泛的或者大致相同的意义。弗斯在他的“论翻译”(1957)的文章里说,“equivalence 是空泛的一个词,最先用于英语翻译理论。”德语中最初采用 Äquivalenz 这个术语是从数学、形式逻辑上引进的。50 年代兴起的机器翻译,当然需要这种对等,但是在专门领域之外就不一样了,因此 equivalence 的翻译概念须重新思考。

与上述的 equivalence 不同,另一有影响的理论是 Nida 的二元论“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圣经》中“上帝的羔羊”是一个有名的例子。“羔羊”表示纯真、无辜。但在不同的文化里,如对爱斯基摩人来说,他们不知羔羊是什么,因为他们那儿根本无此动物,故将其译为“上帝的海豹”,对他们来说海豹代表纯真、无辜。Nida 所使用的也就是这种语义上近似的对等。

德国翻译学中心流派首先出现的是莱比锡语言学派,关于“对等”争论达到高潮。其中有重大贡献的当是 Kade(1968)和 Filipec(1971)。Kade 指出,它由四个明确界定了的对等类型体系所组成,在规范术语学里完全一致的对等,一对多对等;一对部分对等

以及“零对等”。他所涉及到的是通过量化途径的专门语言翻译,而通用语言翻译的复杂性是他的理论体系不能覆盖的。但是他提出了“潜在对等”概念,而译者从中选择了“最大值对等”来讨论问题,但这又是一种将翻译过程看成过分简化的过程,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翻译理论不加批评地将其囊括到文章中去。总之,Kade 的对等类型说妨碍了翻译的发展,因其局限在单个词的层面上,明显局限于语言观。与 Kade 理论相反,Filipec(1971)提出“结构对等”,或者说整体文本对等,与词汇对等相比,迈出了一大步。

进入 80 年代,关于“对等”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视野。除了对德国五种对等类型的继续讨论外,出现了基于 Nida、Kade、Reiss 理论之上的专门化的狭义的科技翻译的对等,还有 Beaugrande 关于对等在翻译中并不起多大作用的说法。1981 年,Stephen Ross 甚至提议说 equivalence 就用 similarity 这个更为空泛的词来代替。同年 Peter Newmark 在他的《翻译途径》中明确指出“我认为象翻译单位,翻译对等及翻译不变等其他方面是死的——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任意的。”Peter Newmark 在《翻译途径》(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2001,4)中说“等效对等是一种希望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目的,有两种情况不能对等,第一,原文作者的目的是影响读者,而目的语是传达信息,第二,源语文本与译语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办法来解决能根本性地指导翻译实践问题的方法。

四、符号学与翻译

雅各布森关于符号和翻译的理论是建立在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研究基础上的。皮尔斯符号学重视交际的所有形式——语言的以及非语言的,皮尔斯理论的焦点放在不断发展的文本上,放在符号运动的形式上。由于皮尔斯理论的丰富性和普遍性,他的符号学理论能作为任何其它种类理论的基础。雅各布森从符号学出发,把翻译进行了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分类:① 语内翻译(in-

tralingual translation)是指同一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变说法”(rewording)。如把古文改成白话文,把广东话译为普通话,把英语诗歌译为英语散文。语内翻译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或在其不同的变体之间进行,一般具有一致的内容和语言文化基础。对一个词做语内翻译,可以选用同义词,也可以采用语汇表示法,但一般说来,同义词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词。翻译时不可避免地会增减原意,通过“改变说法”后,也只能是最近似的对等。正如皮尔斯所指出的,所有定义和解释都是翻译。② 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是指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来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这就是人们通常所指的严格意义的翻译,也是众多翻译研究家关注的焦点。③ 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亦称跨类翻译(transmutation),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语言符号用图画、手势、数学或音乐来表达(李文革,2004:73)。

很显然,符际翻译把翻译的领域扩大到人类交流的方方面面,翻译所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符号世界。符号翻译的优势并不在于信息的传达或思想的表达,而在于它的创造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法国诗人维庸的《美丽的老宫女》一诗用罗丹的《丑之美》塑像来表达,罗丹以富有表现力的雕塑符号,将维庸的诗意整个突现了出来。诗歌和雕塑,表现符号不一,但传达的精神是沟通的。雅各布森的这一分类方法在翻译界已成为公认的权威,虽然这三种类型的翻译实际上早已存在,但雅氏是第一个对之进行高度概括和论述之人。同时,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翻译能使翻译跨出纯语言研究的范围而进入一个更加广阔而绚丽多彩的天地,即文化的研究,能够全面系统地描写翻译中的非语言因素。雅可布森在论述翻译的三种类型时,分别使用了三次“解释”(interpretation)这个词,他似乎默认了翻译是三种不同的解释。这和皮尔斯

的“翻译就是符号解释,符号解释就是翻译”的观点不谋而合。笔者认为“解释”的范畴比“翻译”要大得多,“翻译”不过是诸多“解释”现象中的一种。“改变说法”和“跨类翻译”中有很多是超出翻译范围的,是属于解释活动的。翻译活动要根据上下文做出适当的选择,而符码之间的替代则是没有选择的自由的,因而不属于翻译。解释的东西一般比原文要长,且意思更为显豁,所以解释的概念和范畴较翻译要宽泛。真正的翻译强调的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忠实”和“对等”(指效果的对等)。必须要传达出和原文一致的表达效果和写作风格,而不只是传达出内容即可。而这一点,在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中都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只能算作一种解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翻译。

五、解构主义理论

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起源与解构主义直接相关。在上世纪 60 年代,冷战的阴霾和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解放运动使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的热浪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本质上的断裂,以反对结构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目的的新文化观——解构主义便应运而生,并迅速变成主流话语,从法国风靡全球。解构主义的“去中心”思想给许多学科以深刻的启示,对翻译的理念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翻译观都未逃出“直译”“对等”或“忠实”的制约。“唯原作是中心”提倡相同的审美体验、追求同一的语言功能、复制原文的结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尊为翻译美学的规范。解构主义学者一反传统的翻译美学观,发展出破解原文至上的差异美学。具体而论,解构主义翻译观在西方主要经历了“纯语言”(pure language)、“延异”(diferalice)和“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等三个发展阶段。

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纯语言”世界里,语言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的亲缘关系,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多边的、平等互补